

相关。在此从在方法论上最低限度地简述以下几点。

(3)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与研究的“客观性”

萨依德所指出的东方主义的问题，对18世纪末世界近代史拉开序幕以来直至今日一直束缚着东方 (Orient) 与西方 (Occident) 学术界的科学认识陷阱产生了巨大冲击。³⁶ 东方主义的出现与近现代的开端几乎在同一时期，在科学方法论上具有象征意义。

如前所述，以近现代科学的建立为契机，研究者产生了可根据自己的目的性价值判断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构的单向 (unilateral) 意识，反过来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反作用却被科学实验室这样有意识的防盾 (shield) 所遮蔽了。很明显在这里研究者 (主体) 处于相对于研究对象 (客体) 的优越地位。

东方主义的世界认识基本上将西方置于东方之上，这也是近现代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将西方置于近现代科学的主体地位，将东方置于客体地位的结果。这样当然就在西方世界里诞生了称之为“东方学”的以东方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

当然，完全遮蔽研究对象 (作为客体的东方) 对研究者 (作为主体的西方) 的有意识作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通常存在双方 (bilateral) 互动性的有意识作为，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就更是如此。但东方主义确实是西方基于自己的目的性价值判断来对东方进行重构的产物，这就使舍弃来自东方对西方之行为的倾向更加强烈。这也是东方主义产生的根据。

在东方主义的概念之下，西方通过将东方作为殖民地加以认识和重构确立了西方的自我认识 (西方的概念)。这种自我认识中也包含了西方对世界进行重构的目的性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即使在东方主义里，西方这个概念在意识到东方的存在之前也是不存在的。同样，对于东方，作为东方的自我意识 (东方的观念) 只有从意识到西方的存在后才开始存在。

东方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对世界进行重构的西

方的目的性价值判断本身，笔者已经论证了任何对世界的认识都会有受到当事人所在的时间和空间制约的目的性价值意识 (意识的存在受限性)，这本身并不能成为世界认识缺乏“客观性”的证据。认识的“客观性”只有通过克服目的论与因果论的混淆才有可能获得。

东方主义的问题在于，在这种观念下成为主体的西方对客体的东方保持优越地位，因此导致了实质上的对东西方世界间之双向互动的忽视。

东方因为西方的出现被迫改变了自己，但同时西方也因为发现了东方而改变了自己。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仅是东方的世界认识发生了改变，西方的世界认识也被改变了。这种东西方的“世界与世界认识”的变化正是由于它们相互之间不可能被机械性分离的有机结合才发生的。在这种有机结合中东西方相互分享“共同主观性”，并产生了意识间持续的互动。³⁷

东方主义观念中产生的这种“共同主观性”，当然是作为包含某种歧视、压迫和被压迫的意识构造而存在的。西方和东方并不是有史以来就分别以东方、西方而先天存在的，而是经过东西方之间的支配、被支配 (侵略、被侵略) 的接触，伴随着“共同主观性”的差别性意识构造的形成，才被冠以西方东方之名的。

从历史上看，西方拥有自己是西方这样的观念主要来自于 (经14世纪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到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时代的哥伦布、达迦马、麦哲伦等的) 发现东方的存在以及其后的殖民地经营，从东方带回的各种新奇物品和游记等，更主要的是通过奴隶贸易和移民带来的人员流动所形成的。而东方这一观念的形成也是这种不幸的东西方之间的歧视、压迫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

这一点如果用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论中使用的“性 (sex) 与性别 (gender)”的概念框架考虑会更易于理解。

波波瓦尔1949年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写道：“女性并不是天生就是女性，是被作为女性创造出来的”。³⁸ 在这里与生理、生物学的“男性”相区别

的“女性”，以及通过赋予这种差别以社会和文化意义而被他律性区别形成的“女性”在概念上被区分开来了。前者的“女性”是作为“性”的“女性”，后者的女性则是如20世纪80年代I·伊里伊奇等作为“性别”加以定义的“女性”。³⁹当然这是因“男女”间建立了共同相互关系性（共同主观性）才创造出了“女性（gender）”。就是说不仅是“女性”，“男性”如果没有与“女性”的“相对性”关系意识，就不可能作为“男性”存在。⁴⁰

这种男女间的“相对性”关系意识中“女性”受到歧视的过程，按照波波瓦尔的观点，就是通过“女性”作为“男性”的“他者”被强迫像客体那样存在的产生过程。⁴¹

比起“主体”可以作为对“客体”进行有意识行为的存在，“客体”却无法对“主体”进行这种有意识的行为，或者被看成是不被允许进行有意识行为的存在，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成为“主体”的一方对被塑造成“客体”的一方保持优越性就是因此产生的。

重要的是，围绕着“性”在“性别”上产生的男女间歧视性的“共同主观性”，并不是从这种意识的外部通过强制得以维持和固化的，相反，这种歧视是男女间在相互意识方面进行相互了解后才得以持续和稳定的。

必须承认，和上述“性别”的性质基本一样的构造在东方主义中也一目了然。也就是说，西方和东方之间相互存在的“共同主观性”所产生的歧视意识构造不仅仅是靠政治、军事压制得以维持的，更多的是通过西方和东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得以维系的。

在日本的现代中国学里，上述东方主义意识构造从明治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

（4）现代中国学与东方主义

前面我们提到了竹内的主张：“（日本人）自己没有问题，就去（中国），什么也看不清”。实际上这就是为了自觉认识到中日间存在的这种包含东

方主义差别构造的“共同主观性”而提出来的。可以说，竹内的方法论就是主张“在现在的日本中看现代中国”，反过来也就是强调“在现代的中国里看现在的日本”。

像这样用中国的镜子照日本、用日本的镜子照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就在于日本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建立在两者的“共同主观性”构造之上。正是这种“共同主观性”才使得中日两国的“世界与世界认识”因两国官民间的相互意志而不断发生变化。例如日本战后的发展就与中国战后的发展密不可分。众所周知，战后日本从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中得到了很多的“实惠”。日本选择了在复兴和安全上追随美国的道路，也就意味着同时选择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的政策。如果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缺乏对日本战后发展的洞察，对中国战后的历程也就很难有本质理解。换句话说，当然可能存在通过对中国战后发展的省察来寻求理解日本战后发展之本质的方法。

沟口雄三评价竹内好时称其“假赞中国之虚行评日本之实”。这实际上揭示了竹内的方法论特点，即竹内试图在中日两国间建立在对方内部观察自己的“共同主观性”构造。

问题在于，从这面镜子中看到的日本和中国都是被“歪曲”了的。就是说连接日中两国的“共同主观性”构造中，包含了妨碍认识“客观性”的“歪曲”。“歪曲”首先来自于大部分日本人并没有看到、没能看到自己战后的发展是与中国战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产生“歪曲”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在评价亚非世界的时候，其历史观具有严重的“一国自律性发展论”的倾向，就是一国的发展首先是由其国内各种条件和要素决定的。这种“一国自律性发展论”的特征并不关注日本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现实存在的“共同主观性”的构造。

这种“一国自律性发展论”很容易导致产生对日本近现代史和发展中国家近现代史的以下评价。即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很好地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的近现代文明和推行欧化政策，才取得了